

“三国”故事题材潮州歌初探*

纪德君** 陈新***

广州大学,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潮州歌中现存《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三国刘皇叔取东川全歌》以三国人物故事为题材的两种唱本。潮州歌中的“三国”唱本是基于清末城市商贸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在说唱文学风行、印刷技术革新的背景下,经由书坊的商业化运作而产生的长篇巨制。唱本虽然依据毛宗岗修订本《三国演义》改编而成,但在妇女形象刻画、英雄心理描写以及抒情性与娱乐性方面,表现出异于原著的民间说唱本色,其在宣传推广小说《三国演义》、普及建构三国历史知识以及社会教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功能。

关键词:清末民初;潮州歌;三国演义;说唱文学

潮州歌,又称歌文、歌册、弹词,是一种盛行于晚清民国时期,为潮汕方言地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说唱文学。潮州歌属于弹词系统,唱词内容上基本为七字句,四句一组,每组一韵,既可连续用韵,又可自由换韵。其在表演方式上不需要乐器伴奏,清唱到底,中间只杂以少量的说白^①。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批准号:17ZDA246)阶段性成果。

** 纪德君(1966—),男,汉族,安徽长丰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广州大学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民间说唱文学、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

*** 陈新(1996—),男,汉族,广东中山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广东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广东卷》,中国ISBN中心,2008年,第403—404页。

潮州歌册有不少是根据明清小说作品改编的,其中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主要有《刘备招亲》《刘备取东川》《刘备取西川》《凤仪亭》等。谭正璧先生曾在《木鱼歌潮州歌叙录》^①中,对潮州歌《刘备招亲》《刘备取东川》改编《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情况有所简述。日本学者上田望在《三国说唱文学浅谈——自清朝至现代》^②,曾列举潮州歌《刘备招亲》下集中的《赵云截江夺阿斗》片段,从语言、文体角度分析其与小说叙事的异同。不过,相对于其他曲种“三国”说唱文学研究来说,潮州歌“三国”题材作品目前还缺乏必要的关注与较为具体、深入的研究。

本文试以潮州歌中现存的《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三国刘皇叔取东川全歌》为对象,对潮州歌册的生成机制、编创特色以及社会文化功能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推动潮州歌研究和“三国”说唱文学的进一步开展。

一 “三国”题材潮州歌册的生成机制

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抢救性地影印了130部旧版潮州歌册,集为《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③。笔者从第31册中获取两种“三国”题材的唱本,即《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四卷四回、《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下全歌》十三卷十三回、《新造三国刘皇叔取东川全歌》八卷八回,总字数约13.7万字。这些唱本产生于清末民初,其编创者是自号“凤城逸士”的下层文人柯丐庭(一作“丐庭”)。《刘皇叔招亲下》云:“欲问此歌何人造,凤城逸士柯丐庭。”《柳世清》卷十末尾则题:“欲知此歌谁人做,凤城逸士柯丐庭。”

薛汕《书曲散记》曾记其所作潮州歌《八宝金钟》《刘成美忠节全歌》,可见他是专业从事歌册编创的能手^④。这些长篇唱本的编创与出版,自然不是孤立的个人化行为,其背后体现了清末民间唱本独特的

① 谭正璧、谭寻编著:《木鱼歌潮州歌叙录 曲海蠡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② [日]上田望:《三国说唱文学浅谈——自清朝至现代》,项楚主编:《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一辑),巴蜀书社,2003年,第76—97页。

③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第3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④ 薛汕著:《书曲散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生成机制。

首先，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壮大，乃是潮州歌文本生成的先决条件。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风行，向来与城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为说唱文学发展壮大提供了艺术土壤。潮州府城作为广东通商要地，曾一度成为粤东最大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潮州知府周硕勋纂修《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记载，潮民“逐海洋之利”；卷三十九《物产》又说，潮民“越外洋，居奇货，而百倍其赢”^①。鸦片战争后，潮州府海洋商贸进一步发达，大量失地农民与手工业者涌入城市，致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并由此刺激了市井文化娱乐业的兴起。潮州歌作为一种市井大众文艺，于是受到了广大潮民的喜爱与追捧。清雍正年间，普宁知县蓝鼎元《潮州风俗考》记载：潮人“好酣歌，新声度曲，灯宵月夜，傅粉嬉游，咿咿呜呜，杂以丝竹管弦之和，南音土风，声调迥别”^②。可见当时潮州歌之风靡。潮州歌册《八宝金钟下》则写道：“清朝宣统三年间，天下太平民安康。清明节后无事故，来造歌文劝世人。”这说明即使至宣统年间，潮州因受战乱影响不大，仍然物阜民康，所以潮州歌照旧风行，而像“柯眄庭”这样的文人才有闲情逸致安心编写歌册。

其次，潮州歌的风靡，促进了唱本的编创与刊行。由于潮州歌为广大潮民喜闻乐见，因而为给民间说唱艺人提供可资参考、利用的脚本，同时为更充分地满足一些识文断字的市民阅读潮州歌册的需要，一些下层文人积极介入潮州歌的编创，或者与书坊主联手，将民间艺人说唱的脍炙人口的故事记录、整理出来，形成案头读本，刊售谋利，潮州歌册于是应运而生。据记载，咸丰年间，潮州府城李万利杂货店率先木刻印刷潮州歌册，销量可观，获利颇丰，由此引发其他商号如王生记、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瑞元堂、瑞经堂、五福堂、友文堂、王友之堂等，纷纷介入潮州歌册编印行列，一时间刊印了成千上万的唱本^③。现存潮州歌

①（清）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清光绪十九年（1893）重刊本。

②（清）蓝鼎元撰，蒋炳剑、王钿点校：《鹿洲全集》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

③ 陈泽泓著：《潮汕文化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9页。

中的三国故事说唱文本，其封面正中题署“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版”，每卷卷首右下则题为“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板”，由此可知潮州歌中三国说唱作品的创作、出版、发售与这两家书坊密切相关。而正是这些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生产兼营销的私营书坊，在商业化的运作下，才使得潮州歌能以唱本的形式流传下来，其对于说唱文学的保存与传播功不可没。

再次，清末民初印刷术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潮州歌册的编创与刊行。晚清以来，西方铅印与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并很快取代了传统作坊木刻技术，印刷效率、印刷质量均获大幅提升，从而为民间唱本的刊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并极大地刺激了民间唱本的大量编创与复制。我们只要翻开《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便会发现其四卷四回中都有书场开头的定场诗，在此后其他唱本中便没有，这种文本的前后差异说明书坊主直接从书场搜罗的艺人底本至此已印刷殆尽。为解决稿源不足问题，书坊主遂雇请下层文人从事唱本编创。如柯昞庭就是其中一位，他一边参照毛本《三国演义》，一边坚持去书场听记，于是潮州歌“三国”说唱故事便一卷接一卷地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诞生。这也难怪《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下全歌》十三卷与《新造三国刘皇叔取东川全歌》八卷，比起《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四卷的篇幅多2—3倍，其中前后的篇幅差异，实是反映当时潮州三国说唱文学创作状况的晴雨表。

总之，潮州歌中三国故事唱本的产生，是由清末潮州商贸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说唱文学的风行、书坊的商业化运作、印刷技术的革新等多种物质、精神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推动所致，它牵涉艺人、演出、听众、出版、阅读等多个方面，构成一条以商业运作为动力的文化消费链。

二 “三国”题材潮州歌的编创特色

潮州歌虽然在情节框架、人物形象、战争描写方面继承毛本《三国演义》，但又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对小说原著加以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妇女形象的刻画、心理描写，及抒情、娱乐方面进行了开拓与创新。

其一，妇女形象的丰富与发展。小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战争史诗，主要讲述帝王将相驰骋天下、建功立业的故事，女性则成为男

性勾心斗角的工具和牺牲品，毫无独立性可言。但是，在潮州歌中，女性形象、情感与品性等则成为艺人讴歌的重要内容。这自然与潮州歌的演唱者以女性为主密切相关。蔡泽民先生在《潮州风情录》中曾说：

朗唱人一色妇女，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一种是业余的，职业朗唱的多半是寡妇、孤苦无依的老妪，也有个别是戏班退下的女戏子。她们手提一只花篮，装几部歌册，沿门乞唱，听者点什么唱什么^①。

至于听众自然主要为女性。余亦文曾撰文回忆：

我小时候，常跟妈妈到外婆家听歌册。每当夕阳西下，晚饭已毕，外婆家的小小天井就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邻居姐妹、大姆大婶、婆媳妯娌，有的把绣花规、刷纸架也搬来，边听唱，边干活……听到伤心处，一个个眼泪汪汪；听到奸贼恶计害人，一个个咬牙切齿；大团圆了，或恶人伏法了，大家喜上眉梢，尽兴而散。至今时隔几十年，有些老阿婆还能随口背唱出几段来，对剧中人物之间关系及情节，更是一清二楚，滴水不漏^②。

因此，潮州歌艺人在说唱“三国”时为了迎合广大女性的接受心理与情感愿望，自然会有意地对家庭故事、夫妻之情等进行书写和渲染。这集中体现在对吴国太和孙宫主形象的刻画上。小说写孙权采纳周瑜的美人计，诓骗刘备入东吴娶亲，试图将刘备软禁甚至暗害。吴国太了解情况后，先后3次责骂周瑜、孙权，潮州歌中则将3次责骂变成15次，诸如：“刘备若是被凭刷，吾女便是一寡妇。后日若欲议亲来，谁人欲这退头婚？岂不殃吾女钗裙，一世讨亲无人欲！”这便淋漓尽致地渲染了一个母亲因爱女心切而又义愤不已的情绪。女儿深夜不归，她忧心忡忡：“至晚还未归回返，总然玩景在江滨。日晚亦自归回来，愈想愈更急满怀。”得知女儿与刘备私

① 蔡泽民著：《潮州风情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94页。

② 余亦文：《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潮州歌册》，《福建日报》2009年2月1日。

奔荆州，她则“捶胸顿足放悲声，本后单生只一女，今日被他逃走行，叫吾老身何所依”！可见，她对周瑜孙权的行为是颇为恼怒的，她关心的只是女儿的幸福与自身的依靠，哪管什么政治上的利害得失！而这不正是现实生活中普通女性的逼真写照吗？艺人如此演说吴国太的故事，很容易引发那些妇女听众的共鸣。又如孙权妹妹，按小说所写，平时“好观武事”，喜欢舞刀弄枪，潮州歌则有意突出她天姿国色的一面，说她“生得貌美既超群，又能文来又能武”“果然倾国倾城貌，青春少年动人心”；并且，她还喜爱鲜花歌舞，其住所“但见异花栽满庭，五色花蕊鲜又明”“各处摆列众珍奇，女乐歌唱来接伊”。这样一来，飒爽英姿的孙夫人便平添了几许娇媚动人的色彩。不仅如此，孙夫人还忠于爱情、敢于反抗，她在得知刘备欲返荆州时，当即表示：“妾已共君结罗系，一夜夫妻百夜恩，岂忍尔我折离分，任尔欲往何方去，天南地北愿随君！”在逃亡的路上，她又奋不顾身地保护夫君，叱退追兵，指责哥哥吴侯漠视亲情，践踏她的美好姻缘。总之，民间艺人深入到小说对于女性形象描写的空白处，基于民间的情感心理去重塑女性，甚至不惜在说唱文学中颠覆男权社会的既定法则，既反映了潮州歌中女性群体的审美期待，又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女性地位的变化。

其二，男性英雄情感心理的抒写。潮州歌还注意揭示男性英雄的情感心理及其流变。本来，《三国演义》叙述刘备东吴招亲，只偶尔涉笔其“暗想”“自思”等内心活动。而潮州歌则频繁地描绘刘备内心的情感波澜。如东吴择定吉日呈上婚帖时，刘备“只是怀疑不敢往，日下纳闷愁皱眉”；洞房花烛之夜，“玄德还礼揖尔尔，举目来看孙夫人，果然倾国倾城貌，青春少年动人心”，又见“女乐献酒列两旁，珍馐美味列席中，异花玩好摆满目，玄德岂不心头双（爽）”，不仅将之前的忧惧抛到九霄云外，而且很快便醉入温柔乡中，并且有点乐不思蜀。所以，当他不得已逃离东吴，赶回荆州时，“想起早日在江东，繁华快乐世无双。今日回归荆州去，又欲劳功受艰难。不觉凄然暗伤心，两眼如珠泪淋淋”，居然因不能再醉生梦死而凄然落泪，这与凡夫俗子有什么两样？想必当年市井观众听到这里一定会忍俊不禁。不过，刘备毕竟是有抱负的英雄，所以一转念便自责道：“今日得了快乐事，岂可忘却早忧时。况吾乃是汉室亲，须当励志想奋身。不可徒甘居人下，身立背面口称臣。”如此这般，艺人遂将

刘备招亲前后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描绘得一波三折，惟妙惟肖，既赋予刘备以丰富的人情味，又拉近了人物与听众的心理距离，增添了英雄人物的人格魅力。

由此也可以看出，潮州歌是颇擅长抒写人物感情的。这一点，从诸葛亮气死周瑜后前往吊孝一节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其长于抒情的特点。小说中诸葛亮的祭文固然情词并茂，但典雅不俗，不适合书场说唱，所以潮州歌既要讲祭文的文辞通俗化，又要做到音韵和谐，入耳动心。请看它改编的《吊周瑜文》：

吊君自幼学	相交孙伯符	仗义共疏财	茅舍相让居
吊君自弱冠	万里奋鹏抟	定鼎建霸业	割据在江南
吊君年方壮	远镇主巴丘	景升常忧虑	讨逆尚无忧
吊君有丰度	佳偶配小乔	俨然汉臣婿	不愧立当朝
吊君有气概	谏争纳质回	始不垂两翅	终能奋翼飞
吊君在鄱阳	蒋干来说君	挥洒真自如	雅言志不群
吊君有宏才	文武镇封疆	火攻能破敌	反弱来为强
想君当初日	雄姿莫并俦	哭君身早逝	俯地血自流
忠义心如铁	英灵气自专	性命终三纪	名垂万古传
哀君真情切	愁肠方结心	我惟明肝胆	悲无断绝略
惨惨天昏暗	三军方怆然	主为尔哀泣	友为尔泪涟
想吾虽不才	乞计常求谋	助吴拒曹贼	辅汉安刘公
首尾无数月	可怜君命休	若存与若亡	何虑共何忧
呜呼周公瑾	生死永别离	忠贞常朴守	冥冥灭灭时
君魂如有灵	前来鉴吾心	从此通天下	更无一知音
悲悲共切切	肠断谁知详	呜呼真痛哉	伏惟来尚飨

艺人先一口气用了七个“吊君……”，排比铺陈周瑜从幼至壮的传奇生平，夸赞他“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非凡气概；接着用对比手法，慨叹其年少有为，惋惜其英年早逝；然后通过“惨惨天昏暗，三军方怆然，主为尔哀泣，友为尔泪涟”进行侧面渲染，最后则用“从此通天下，更无一知音，悲悲共切切，肠断谁知详”直抒胸臆，这样反复皴染，遂将

一种悲伤哀悼之情抒写得酣畅淋漓，充分发挥了潮州歌擅长抒情、以情动人的文体优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潮州歌册大量流行的同时，民间书场并没有因之而冷落萧条。

其三，娱乐性的彰显。潮州歌的受众主要是城市手工业劳动者组成的小市民群体，他们在劳作一天后来书场听书是为了消遣娱乐，所以潮州歌必须站在民间立场，讲述老百姓心中的三国人物故事，在诙谐幽默的风格中表现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潮州歌的娱乐性主要体现在：

1.对历史人物的调侃与戏谑。潮州歌中的三国人物，经过了世俗化的艺术处理，不再带有神圣的光环，而更接近于世俗大众。如孙权不再是少年得志、叱咤风云的碧眼紫髯帝王，当他得知刘备中计来到东吴提亲时，“暗想刘备到这来，真是入了天罗网，痴想吾妹结和谐。枉尔一世英雄人，今来绝命到此间。可笑孔明好妙计，亦放他来入牢笼，想罢哈哈大笑声”，颇有一种小人得志、忘乎所以的味道。就连主人公刘皇叔，有时也免不了遭到说书人的调侃、戏谑。如刘备到东吴招亲，胡子花白，怕人嫌弃，怎么办？于是他“便将黑墨来染须，身穿金甲共绶绸，装得一表贵人格”，这种扮嫩装贵的举动着实让人感到滑稽，但这正是一个普通人常有的心理，艺人如此一说，就将刘备俗化了。

2.利用人物性别、年龄、外貌等方面的反差，制造出人意的喜剧效果。如吴国太和孙宫主，虽是女流之辈，但在气势上力压一众英雄男儿，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之风；又如黄忠和严颜，虽然年事已高，但武艺谋略不减当年，为刘备夺取汉中屡建奇功；再如庞统、左慈、管辂，才干非凡，可是相貌奇丑。艺人对这些反差的刻意渲染，就引发了受众一连串的笑声。

3.夸饰怪力乱神之事，迎合大众猎奇心理。本来，《三国演义》就不乏神异的叙事成分，如对于左慈、管辂等奇人奇事的叙写。说唱潮州歌的艺人，则进一步迎合世俗大众迷信鬼神、嗜奇好怪的心理，进一步对左慈的神奇际遇、超验能力等不厌其烦地进行夸张和渲染，又利用管辂占卜时所写的字谜，与受众进行现场互动，制造悬疑，既吊人胃口，又趣味横生。

总之，潮州歌既侧重对女性形象的丰富与发展，又注重对英雄男儿内心情感的揭示与书写，不仅顾及女性群体的抒情性诉求，还刻意迎合市井

大众的消闲娱乐需求，从而展现出生动活泼的民间说唱本色。

三 “三国”题材潮州歌的社会文化功能

潮州歌是一种为潮州民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而《三国演义》又是家喻户晓的小说名著，以潮州歌去说唱三国人物故事，自然会深受潮州民众的欢迎，从而在传播、普及《三国演义》，发挥社会教化作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国演义》的叙事特点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古朴雅正，意蕴深厚，实际上并不适合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阅读。所以，自从《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各地的民间说书艺人就不断对它进行改编、演说，由此形成形形色色的三国说唱艺术，不断扩大《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就潮汕地区而言，《三国演义》的传播，实际上主要靠的是潮州歌与潮剧，而潮州歌由于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演出，因而影响更大。不仅如此，潮州歌艺人说唱的“三国”故事，如果比较精彩、叫座，脍炙人口，那么又会被书坊主雇请下层文人记录、整理成册，形成通俗易懂的潮州歌册，以满足粗通文墨之人的阅读需求。而“三国”故事题材潮州歌册的普及、流行，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们识字的动力与能力，另一方面更广泛地促进了“三国”英雄人物故事的传播与影响。如书坊主李万利不仅刊印了《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还特意编制了长达一千六百多字的《新造三国古人拆字歌》，内容上以拆字为起式，后接关于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整饬七字句，且做到隔句押韵，令人耳目一新。试看下述几段：

古月两字读做胡 刘邦兴汉创帝都 传至献帝国衰败 分为
三国魏蜀吴

三点水青就是清 皇叔桃园三拜盟 义结关张愿扶主 誓诛
汉贼扶朝廷

天下蛤口就是吞 刘备即位昭烈君 一心欲伐吴与魏 重整
汉室锦乾坤

三点水王独做汪 孙策遗祖居江东 当初大战严白虎 人人
称为小霸王

木字站人便是休 孙权碧眼又紫髯 二十四年真命主 威镇
江南八十州

壮字草头读做庄(莊) 东吴大将是周郎 官拜水军大都
督 赤壁放火破曹军

秋心二字读做愁 奸雄曹操镇许都 总领兵权居相位 势压
天子令诸侯

金字畔十便是针 曹丕废帝篡国邦 自立为王称魏帝 三分
天下居许昌

曹头田字就是苗 三国尽归司马昭 生有一子司马炎 一统
山河属晋朝

说唱艺人将三国兴衰更替的历史过程，巧妙地浓缩在千余字的拆字顺口溜中，使得妇孺老幼对于三国历史皆能信口道来，让人看到了民间艺人在普及三国历史知识方面独特的民间方法与民间智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大量的民间艺人从事着城乡“历史教师”的工作，广大听唱的群众则扮演着“学生”的角色，无数的三国唱本则承担着“民间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书场则变成了授课的“历史大讲堂”。于是在潮汕地区，无论衣冠白丁，还是男女老幼，对于“刘备招亲”“智激周瑜”“单刀赴会”“取西川”“取东川”等三国历史故事往往耳熟能详，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得到彰显，儒家伦理道德得以弘扬，而对刘关张等英雄的崇拜更是深入人心。潮州学人余亦文即说：

早时潮汕妇女，能上学堂的很少，许多见识如道德规范、品性、情操、为人处世、是非原则、善恶观念等，都是从潮州歌册学来的^①。

不仅如此，潮州歌还培养了潮州女性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文化皈依感：

早时妇女出嫁或随夫漂洋过海谋生，嫁妆与行囊中，一定要

① 余亦文：《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潮州歌册》，《福建日报》2009年2月1日。

带上几本心爱的歌册，寄情以传乡音。在海外的潮人，不少幼时携带潮州歌册走了，长大了一听潮州歌册，乡情油然而生^①。

另外，潮州人因为崇拜关羽，为关羽建庙，虔诚地称之为“关老爷”，每年“关帝诞”还会定期举行庙会祭祀活动，潮州地区的商人还把关羽作为“武财神”供奉起来。诸如此类民俗文化的形成，实际上就与潮州歌对关羽等三国人物故事的说唱传播有密切关系。

总之，清末流行于潮汕地区的潮州歌，在改编说唱《三国演义》、传播普及三国历史文化、实施政治伦理教化等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功能，这对于今人研究清末潮汕的民间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通信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广州大学人文学
院，邮编：510006。

责任编辑：赵晓涛

^① 余亦文：《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潮州歌册》，《福建日报》2009年2月1日。